

综 述

1921年7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经过五四运动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19世纪中叶，由于国际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解体，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受到外国侵略者和国内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和残酷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改变这种状况，中国人民顽强地进行长期艰苦的斗争。继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之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尚未完成，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继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

随着国际资本主义在华开办企业，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较快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在反抗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剥削的过程中产生并不断成长壮大。到1919年，全国各类工厂已达几千家，近代产业工人达到200万人左右。与此同时，帝国主义的侵略所激发的民族觉醒，在中国产生了一代新的民主主义革命知识分子。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自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提倡科学和民主，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全国掀起的新文化运动日益深入知识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1919年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和先进知识分子的加入，而成为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到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转折点。

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民主运动，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革命知识分子由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1920年3月，李大钊等在北京大学组织马克思学说

研究会 5 月，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同年底，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同毛泽东通信，讨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得到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帮助。1920 年 4 月 经共产国际批准 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派维经斯基^①等人到中国，先后会见李大钊、陈独秀，了解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状况，认为中国业已具备建立共产党的基本条件，并具体研究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20 年 8 月中旬，在中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 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 陈独秀任书记。11 月 上海小组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提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上海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0 月 北京建立共产党小组 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 李大钊任书记。北京小组曾帮助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的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 对北方党、团组织的建立起了促进作用。从 1920 年秋到 1921 年春 湖北建立以刘伯垂、董必武、陈潭秋等为成员的武汉共产主义组织，湖南建立以毛泽东、何叔衡等为成员的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山东建立以王尽美、邓恩铭等为成员的济南共产主义组织，广东建立以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为成员的广州共产主义组织。在国外，中国留法学生建立以张申府、赵世炎、周恩来等为成员的巴黎旅法共产主义组织，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建立以周佛海等为成员的旅日共产主义组织。当时 上述组织名称不一 有的为“共产主义小组”有的称“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后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以下本书统称共产主义小组）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有计划、有组织地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 年 8 月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本出版。9 月 由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 改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公开的理论刊物。11 月 由李达主编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又出版半公开的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各地共产主义

^① 维经斯基（1893—1953），苏联人 俄文名为 Г. Н. Войтинский。1920 年 4 月，率俄共党小组来华，任务是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1923 年 11 月再次来华，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

小组继续对各种流派的社会主义，尤其是无政府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进行批判。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投身到工人中去，从事群众工作，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条件。

1921年3月，共产国际在苏俄伊尔库茨克建立远东书记处，下设中国、蒙古、日本、朝鲜等支部。维经斯基任书记处秘书。张太雷曾随同维经斯基到远东书记处中国支部工作。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①到达上海。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为接替维经斯基的工作，已先期到达上海。两人很快与李达、李汉俊建立联系，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筹建的情况，建议尽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负责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李达^②根据原先酝酿的意见和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分别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商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中的共产主义小组或同志，通知他们各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出席会议。

1921年7月23日^③，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家召开。参加大会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代表有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湖南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山东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水族），广东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④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参加了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因故没有出席会议。会议期间，曾遭到反动当局密探

① 马林（1883—1942）荷兰人，荷兰文原名 Hendricas — Sneevliet，马林是其俄文译名 Маринг。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来华工作，1923年返回共产国际。

② 1920年底，陈独秀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就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离沪之后，由李汉俊代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书记。1921年2月至8月，由李达代理上海小组书记。

③ 大会召开的时间，和后来确定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不一致。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作《论持久战》的演讲时提出“七月一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十七周年纪念日”。此后定7月1日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参加过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两人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记不清确切的日期。现据史料考证，已确定一大的开幕日期为1921年7月23日。

④ 出席中共一大13人中，陈公博、周佛海先后于1922年、1924年叛党，后任国民党要职，抗日战争爆发后沦为汉奸。刘仁静，1929年参加托派组织，被开除出党。张国焘，1938年4月叛党，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包惠僧，1927年脱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国务院参事。

的注意和外国巡捕的突然搜查，代表们临时转移到浙江嘉兴，在南湖的游船上继续举行会议。8月1日会议闭幕^①。大会决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纲领》郑重宣告：“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党的纲领是‘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纲领》提出要‘联合第三国际’。《纲领》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手续、建立地方组织的原则以及党的纪律等。《决议》提出开展工人运动和党的宣传工作的任务与要求，同时还规定对其他政党和第三国际的态度。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中央局由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分管宣传，张国焘分管组织。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央局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到1922年6月，直属中央局的地方组织有武汉区执委、湘区执委、广东区执委、上海地委、北京地委、济南独立组等，党员发展到195名。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得以较快发展。1921年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统一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分别举行。至此，全国已有17个地方建立了青年团组织，团员达5000名^②，建立工会组织100多个，会员达30万名。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2名，代表195名党员。大会分析当时中国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压迫、统治的特点，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在现阶段的革命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包括东三省）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大会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提出，加强党的建设是贯彻实施民主革命纲领的组织保证，并第

^① 关于中共一大的闭幕日期，党史学界存在8月1日、8月2日、8月5日几种说法，这里取8月1日说。

^② 根据1922年5月15日出版的《先驱》第8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和1922年7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6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大会纪略》。

一次对党的组织建设的原则、方针等问题作出了比较具体、明确的规定。大会还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从此中国共产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青年、妇女组织也分别加入第三国际领导的赤色工会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亦称青年共产国际）和共产主义妇女国际。会议依据《章程》规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邓中夏为委员，并选出了3名候补委员（姓名不详）组成中国共产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被推选为委员长。

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并于会后通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也采取这个政策”^①。根据这一决定，陈独秀、李大钊即同孙中山等国民党领导人会晤，商谈国共合作问题。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下，孙中山决心整顿和改组国民党，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这一时期，在中共各级组织和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下，各行业工人先后举行百余次罢工斗争，中国工人运动出现第一个高潮。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遭直系军阀血腥镇压，中国工人运动转入低潮。

1923年1月、5月，共产国际先后给中共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6月12日至20日，为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制定同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30多名，代表党员420名。大会通过《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党内合作关系。自此，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党的机构设置都与国民党发生密切联系。会议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须“渐渐扩大我们的组织”。大会选出委员9名、候补委员5名，组成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为委员长，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5人组成中央局。这次大会，成为中国共产党从比较狭小的圈子里走出来，向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转变的起点。

在组织建设方面，中共三大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首

^① 《团中央第三十六号通告——劝告团员加入国民党》，1923年3月16日。

次对党的中央组织结构、职责分工、工作制度等作出具体规定。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对党的“基本单位”小组的组织规定“凡有党员五人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对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组建，改为一地方有党员十人以上“经中央许可”，推举三人组织该地方执行委员会”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常务机构中央局和中央特派员。大会选出 9 名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 5 名组成中央局，4 名为中央特派员分派各地工作。

中共三大以后，共产党在组织上采取许多实际步骤，帮助国民党改组并扩大其组织。1923 年 9 月，李大钊与国民党员王法勤等在北京建立国民党组织。11 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三届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上，通过《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共产党在目前的全部工作，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积极推进国民革命运动。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 年 1 月 20 日至 30 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出席大会的 165 名代表中，有共产党人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瞿秋白、林伯渠等 23 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的 24 人中，有共产党员李大钊等 3 人；当选候补中央执行委员的 17 人中，有共产党员毛泽东等 7 人；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占近 1/4。在各部共产党员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如组织部长谭平山、农民部长林祖涵、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等。有些省区国民党的负责人，由共产党员担任，如湖北的董必武、陈潭秋，湖南的何叔衡、夏曦，浙江的宣中华，江苏的侯绍裘，北方的李大钊、于树德、李永生、于方舟等。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

1924 年 5 月，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创办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亦称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简称黄埔军校）。共产党从各地选派大批党团员和革命青年到军校学习，在第一期学员中，即有共产党员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社青团）员 56 名，占学员总数的 1/10。共产党员周恩来、熊雄先后担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等担任军事教官、政治教官。

国共合作的实现，促进了工农群众运动的发展。1924 年下半年，全国革命运动开始高涨。7 月，数千名工人在广州沙面租界举行政治大罢工，抗议英法

帝国主义者限制中国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同月，经共产党人提议，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名义，在广州开办中国国民党农民运动讲习所，先后由共产党员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主持，培养一大批农民运动的骨干。在国共两党的推动下，1924年下半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建立反帝大同盟和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内容的国民革命运动。

国共合作最初一段时间里，由于共产党员大半加入国民党，忙于国民党的工作，忽略了自身的组织工作。许多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复杂情况认识不足，担任国民党顾问的苏联人鲍罗廷^①对国民党内的右翼势力又过于忍让迁就，因而，在共产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发生某些离开中共三大决议精神的倾向。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和二中全会上，提出所谓一切运动归国民运动，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错误方针；对党员的发展则采取消极态度，党的组织发展一度出现了停顿与徘徊。从中共三大到三届一中全会前，党员增加不过百人。到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召开时，党员人数还有所减少。这时，新建立的中共地方组织有济南、南京、汉口、武昌地执委，哈尔滨、杭州、成都独立组等；同时撤销的有水口山、常德地执委，上海、广东区执委均改组为地执委。上述各地执委及湘区、北京区执委兼北京地执委，均直属中共中央管理。

1924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总结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纠正党内组织工作中的偏差，对党的组织建设给予特别的重视。这次会议之后，党的组织工作得到改进，中共中央工作机构相继建立。9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关于民校工作^②合作办法》，决定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社青团员应合组党团，党团工作由党的地执委或区执委直接指挥。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在非党组织中设立党团（即后来的党组）的最早规定。11月，中共中央首次设政治局，由陈独秀、蔡和森、维经斯基3人组成。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出席代表20名，代表党员994名。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以及在宣传工作、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方面如何

^① 鲍罗廷（1884—1951）苏联人，俄文原名 М. М. Бородин，又名格鲁申贝格（Грузенберг）。

^② “民校工作”指国民党的工作。

迎接大革命的高潮。会议分析各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态度，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会议确定党的组织路线是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使党群众化。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建设，要求必须“扩大党的数量，实行民主的集权主义 巩固党的纪律”。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规定 中共中央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各级党组织的委员长均改为书记；党的组织系统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支部干事会 党的基础组织由设小组改为设支部；“各农村、各工厂、各铁路、各矿山、各兵营、各学校等机关及其附近，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支部人数过多时，得斟酌情形分为若干小组”。按照修改章程的规定，大会选举产生中国共产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 由执行委员 9 名、候补执行委员 5 名组成。中共四届中执委第一次会议决定由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为总书记。同时取消政治局的建制。

中共四大的召开和五卅运动的爆发，推动了中共组织的大发展和中国第一次大革命高潮的兴起。1 月 26 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决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称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当时团组织已扩大到全国各重要城市和工业区域，团员有 8000 多名。5 月 1 日 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据不完全统计，此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组织，全国有 166 个 有组织的工人达 54 万多名。在广东 有 20 余县成立农民协会，会员达 20 多万名 并建立省农民协会。各地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总会，有会员数百万名。在 1925 年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中 全国约有 1700 万人直接参加这场反帝爱国斗争。在五卅运动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得到很大发展。到 10 月 党员人数由年初的 994 名 发展到约 3000 名。不少原来没有党组织的地方，如云南、广西、安徽、福建等建立了党组织。

1925 年 10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执行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五卅运动以来的斗争经验与教训，第一次提出要在“政纲”中列入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要求；会议就孙中山逝世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进行讨论，决定仍继续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 竭力帮助其左派 但会议又决定“非必要时 我们的新同志不再加入国民党 不担任国民党的工作 尤其是高级干部”。在党的建设上，会议指出对于当前的中国革命，“党负着历史上有极大意义的任职”，

为此“第一便要扩大自己的党”。鉴于上海党员增加较多较快，会议决定在上海区执委之下按地区划分若干个“部”，建立“部委员会”，负责领导所属支部的工作。会议要求重视北方各省党组织的发展，指出“应当巩固京区的组织，管理直隶、山西及东三省”等地党的工作。到1926年4月，中共党员发展到1.1万名。党员成分大多为工人，次为学生和农民。除新疆、青海、贵州、西藏、台湾外，全国各省都建立了党的组织或有党的活动。中共中央直属组织有：北方（包括京兆、直隶、山西、陕北、甘肃、三特区^①以及东北三省等地）、豫陕（包括河南和陕北以外的陕西各地）、上海（包括江苏、上海、浙江以及安徽部分地区）、湖南（包括湖南全省、株萍路和安源）、广东（包括广东、广西、云南和福建）、区执行委员会、山东、武汉、江西、福州、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安庆、六安、寿县窑口集、芜湖特别支部和寿县城关、濉溪、旅欧支部等。

在北伐战争开始前，中国政局发生很大变化。先后出现英、日帝国主义与军阀吴佩孚、张作霖联手策划的“反赤”运动，段祺瑞制造的北京三一八惨案，蒋介石制造的打击、排斥共产党人的广州中山舰事件。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所谓的《整理党务案》。6月，黄埔军校又提出“处置共产派问题”等。在这些反革命进攻面前，中国共产党内对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以及对7月开始的北伐战争采取什么方针等问题上产生重大分歧。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会议着重讨论对待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但对问题的认识充满矛盾。一方面提出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方针，重视军事武装的问题；另一方面却没有认识到党应当直接掌握军队，实现建立政权的任务，仍“主张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在党的建设上，强调组织工作“即党指挥群众的枢纽，没有好的组织，便不能指挥广大的群众运动，运用党的政策”。会议第一次提出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和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支部，“在大的工业区域中（如上海、香港、武汉、天津）及大的农村中，如组织发展，支部加多时，应于区委或地委下，添设部委，按区域分划几个‘部’，联合若干邻近之支部，组织‘部委员会’，管理本区域内的各支部工作。”“从中央至区委或地委，从区委或地委至部委，从部委至支部干事会，以至组长

^① 三特区指热河特别区、察哈尔特别区、绥远特别区。

会议 是党的本身一个系统 ”。

1926 年 8 月 4 日，中共中央针对少数党员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向全党发出《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通告“训令各级党部 迅速审查所属同志 如有此类行为者 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

在北伐军占领武汉、上海之后 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此时 工农群众运动特别是湘鄂赣粤农民运动迅猛发展，加速了革命阵营内部的分化；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同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矛盾和对立日趋公开化；帝国主义列强将蒋介石作为他们新的代理人，蒋介石镇压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行为越来越嚣张。面对革命阵营随时可能发生分裂的严重局面，党内发生重大分歧。1926 年 12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当前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按照苏联代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的意见，陈独秀作政治报告，决定进一步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以换取蒋介石“由右向左”把挽救危机的希望寄托在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身上，幻想以退让求团结。这次会议使党内存在的右倾错误思想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并已开始在北京中央占据统治地位。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上海大批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和群众被捕、被杀害，工会组织以及革命群众团体被反动派捣毁或查封。到 4 月 15 日 上海工人被杀者 300 多人 被捕者 500 多人 失踪者 5000 多人。在此前后 国民党反动派在江西、无锡、南京、广东、长沙、宁波、杭州、厦门、福州等地 相继展开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所谓“清党”运动。仅广东被捕杀的即达 2100 多人。4 月 18 日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并勾结帝国主义和川、黔、桂、粤等地军阀 威胁武汉。与此同时 北方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 月 28 日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捕，英勇就义。大革命遭受严重的挫折。

192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9 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出席代表 82 名 代表党员 57963 名。大会选举产生由 31 名委员、14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和由 7 名委员、3 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共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为政治局委员 苏兆征、周恩来、张太雷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陈独秀、蔡和森、张国焘为政治局常务委员 陈独秀为总书记。这次大

会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对革命的领导权、农民土地和军事武装等关系革命成败的重要问题，提不出任何具体有效的解决办法，且对汪精卫政府仍然迁就。

这时的组织状况是，直属中共中央的地方组织有：湖南（包括江西的萍乡和安源煤矿）湖北、上海（包括上海市、江苏、浙江和安徽部分地区）广东（包括广东、广西及福建南部）北方（包括京兆、直隶、山西、绥远、察哈尔、热河）山东、江西、豫区、陕甘 9 个区执委 福州、大连、北满、安徽、重庆 5 个地执委；奉天、芜湖、六安、南陵等 5 个特别支部 濉溪、寿县堰口集支部。此外 在国外的莫斯科、海参崴、日本、法国等地有中国共产党的支部、通讯处或党员。到 1927 年 4 月 党员分布状况是 湖南 1.3 万余名、湖北 1.3 万余名、江浙 1.3 万余名、广东 9027 名、北方 3109 名、江西 3000 余名、陕甘 388 名、河南 1300 余名、山东 1025 名、福建 168 名、南满 380 名、北满 137 名、安徽 233 名、四川 200 余名。党员成分 工人占 50.8% 农民占 18.7% 知识分子占 19.1% 军人占 3.1% 中小商人占 0.5% 其他成分占 7.8%。男党员占 91.73% 女党员占 8.27%。

中共五大决定，将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名称由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改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并设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大会决定中央委员会设政治局。五届一中全会选出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及常务委员。根据五大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的有关规定，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对党章进行修改，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决案》，确定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指导原则 各级党组织均实行集体的指导 加强党内纪律 中央和省设监察委员会 党的组织系统按当时的行政区划设置，即“全国——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 省——省代表大会——省委员会，市或县——市或县代表大会——市或县委员会 区——区代表大会——区委员会，生产单位——支部党员全体大会——支部干事会”。各区执行委员会、地方执行委员会建制随之取消。据此，1927 年 5 月 14 日至 6 月 24 日 先后建立中共陕西、顺直、山西、湖南、山东、安徽（临时）江苏、浙江、四川（临时）江西、湖北、河南省委等。

在中共五大闭幕的同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这时全国团员增加到约 3.6 万名 已建立团区执委 5 个、团地执委约 90 个、团特别支部 270 多个。与此同时，中华全国总工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召开。这

时全国工会会员达 290 余万名。1927 年 3 月底，成立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据统计，至 1927 年 6 月，全国已建立省农民协会 5 个、县农民协会 210 个、区农民协会 1102 个、乡农民协会 16144 个，全国农民协会会员达 900 余万名。

中共五大之后，政治局势急剧逆转，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相继叛变；而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向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仍然对汪精卫抱着很大幻想，视之为国民党左派，并指责工农运动“过火”。7 月 3 日中共中央通过《对国民党关系方面的退却纲领》向国民党作出种种让步。1927 年 6 月底或 7 月初，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过《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提出要采取措施“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会主义错误，并从政治上纯洁党的领导成份”^① 随即发出给中共中央的“电令”^②。7 月上旬^③ 鲍罗廷召集周恩来、李维汉等开会 决定改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新的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之职权。7 月 13 日，中共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15 日 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 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 公开背叛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至此全面破裂。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终于完全遭到失败。

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七一五蒋汪合流，大批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群众团体被封闭，共产党的许多优秀领导人如陈延年、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肖楚女、熊雄、向警予、夏明翰、郭亮、陈乔年等先后牺牲。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27 年到 1928 年上半年，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达 31 万多人 党的活动被迫转入秘密状态。“已经发展到 6 万多党员的党只剩下了 1 万多党员。”^④

7 月下旬，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武装反抗国民党。24 日，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中央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

① 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 339 页。

②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文件《小引》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册 第 247 页。

③ 参考中央常委会议记录及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等资料判定该时间。

④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 第 789 页。

通告》 要求各地党组织领导工农群众 反对武汉政府的反动政策 并指示将党的组织转入秘密状态，指挥全党退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这次会议 标志着中国革命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发展随之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第 一 编
中 央 组 织 机 构

第一章

中共中央领导机构

(1921.7—1927.7)

1920年8月，上海建立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1920年夏秋至1921年春，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及旅法、旅日人员中陆续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开展工人运动，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到1921年五六月间，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发展到50余名。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联系，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①。6月22日至7月12日，张太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的会议。

从1921年7月至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先后召开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中共第一届至第五届中央领导机构。1921年7月下旬至8月初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局。中央局设书记、委员，各委员进行了分工。1922年7月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届中央执委会设委员长，部分委员作了分工。1923年6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三届执行委员会。三

^① 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俄文译稿)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原计划于6月20日召开，因各地和日本小组的代表未能全部按时到达上海，大会推迟到7月23日举行。